

把握总体方向 打造特色党建

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创新举措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罗晓梅

党群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党建工作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体,作为理论化的观念形态,要转化为鲜活的成效,必须通过一定的载体来实践。如何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新要求,落实管党治党责任,拓展党建工作有效途径,实现与特色研究所建设相协调的工作机制,是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党委主体责任具体考量的着力点和突破口,基层党组织建设永远在路上。

一、党建工作把握方向 形成特色格局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特别是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对加强党的建设、营造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提出了全面要求。成都山地所党委保持高度的思想统一,紧跟党中央和中院党组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准确把握研究所党建工作的总体方向,围绕特色所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党建工作着力于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及时制定并执行《成都山地所特色所建设中贯彻落实中科院党组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施办法》,通过建立党建工作特色格局来切实落实管党治党责任。

格局一:健全组织建立党政结合促发展格局。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支部设置和支委会成员的选配注重与科研、行政单元的紧密融合,在科研系统各重点研究室(中心)、管理、支撑系统设置党支部,在各专业研究单元、台站,有一定规模的项目团队设置党小组,在周期三个月以上的野外考察项目和重大应急项目设置临时党小组。科研系统支部书记原则上从研究员党员中选举产生,并兼任本部门副职,管理、支撑部门支部书记从副处级以上党员中选举产生,所有党务工作者均发放党务工作津贴。这种“融合型”的支部设置方式和注重党务岗位人员选拔相结合,为研究所基层党组织发挥作用提供了必要的组织保障,体现了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的紧密结合。

格局二:落实责任建立党建层级管理工作格局。研究所党建工作是否贴近科研实际,是否见实效关键在于工作格局是否明晰,主体责任是否清晰。为此,山地所党委确立了“层级管理、合力推进”的工作原则,梳理划分党委与纪委、基层党支部、党员领导干部、普通党员四个管理层次,针对每一层级的性质和要求,研究制定与之对应的具体实施举措。各层级的工作任务和制度措施注重系统性和连续性,始终围绕管党治党这一主线,层层落实,环环相扣,使党的系统内从组织到个人都能准确把握各自定位,明确自身职责与任务,即明确在全所管党治党中各层级自己应该做什么、怎么做、须达到什么要求和效果标准。

格局三:突出实效建立方案评比检验体系格局。支部活动是党建工作的活力所在和生命力所系。山地所党委借鉴科研项目管理模式,坚持实施基层支部年度活动方案评比和执行交流通报制度,依据评比等级确定经费支持力度,依据执行情况动态调整经费支持,以此加强支部活动在方案设计中、活动实效、执行落实中的全程管理,通过交流检查、年终评议,最大限度提高活动成效,使党建创新实实在在服务于研究所创新发展,服务于基层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二、党建规定动作从严要求不走形式 管党治党的根基在于学习党章、维护党章、遵守党章,体现在日常管理行为上,就是要坚持党内制度执行不变通、不走样。为此,山地所党委近年来先后修订下发了《成都山地所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实施细则》《成都山地所党委工作规则》《成都山地所关于进一步严格党内组织生活的通知》,新制定了《成都山地所支部目标管理考评方案》及《成都山地所特色所建设中贯彻落实中科院党组全面从严治党的实施办法》,建立党支部纪检委员监督支部“三会一课”执行情况工作台账,实行“一学一签”的党员参加组织学习签到制度,并直接与党员民主评议、评先评优及年度继续教育学分挂钩,进一步还原了党组织生活的严肃和自觉,进一步提高了党员的参与率和覆盖面,取得良好成效。

三、党建自选动作联系实际彰显特色 山地所党委倡导推行特色党建活动,注重党建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鼓励各显特色。近年来各基层党支部结合所行政或业务部门工作特点组织开展了各具特色的活动:山地灾害党支部开展与STS项目的献言献策、搭建支部“青年党员俱乐部”;山地环境党支部开展由一名党员研究员帮助一名年轻党员提高业务水平、一名党员和一名党支部书记的“一带一、一带一”手拉手活动;机关支部开展“你读书,我买单”书香支部建设、办公技能评比和培训、野外科考体验;研究生党支部开设研究生支部微课堂、读书分享、主题卡片设计展等。这些形式不一的支部活动体现了山地所各支部的特色。

千虚不搏一实。研究所素有务实之风,富有创新之才。在新的历史时期,研究所党建工作也要始终服务于创新、支持发展为目标,以全面从严治党为主线,切实加强党建工作在研究所科技创新中的实践和指导作用,使基层党组织成为研究所创新工作中富有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坚强堡垒。(作者系中科院成都山地所党委副书记)

长期来看,随着科学共同体逐渐成熟,形成更好的科学共同体诚信建设制度,用声誉来约束科学共同体是未来的趋势。

简政放权的方向肯定是一个进步,但在具体操作上有许多问题需要从制度设计的角度予以充分保障,让专业机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科技重大专项资金:“松绑”与“套笼子”

本报记者 韩天琪



向涛



杨国梁

日前,财政部、科技部、国家发展改革委重新修订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民口)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向社会公布。《办法》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资金的支持方式、简政放权、资金使用方面进行了修改。此次国家将对科技重大专项资金使用再松绑,目的在于不在报酬待遇上亏欠科学家,不让事务性工作打扰科学家,让他们集中精力搞科研、出成果。

中央财政资金是纳税人的钱,宝贵;科研人员是国家的优秀人才,同样宝贵。重大专项又是国家急需解决的科技攻坚难题,资金怎样花才能更有效率,能够更好地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备受社会瞩目。

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据财政部有关负责人介绍,重大专项的财

政支持方式分为前补助和后补助两种。前补助是指项目或课题立项后核定预算,并按照执行进度拨付资金。对于基础性和公益性研究,以及重大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开发、集成等公共科技活动,一般采用前补助方式支持。后补助是指项目单位先行投入资金,组织开展研究开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活动,在项目完成并通过评审验收、取得相应成果后,中央财政再给予相应补助。

“我个人理解,政府资金应当更倾向于基础性、前沿性,提供公共科学产品的领域,应用性比较强的研究还是要以企业资助为主体。”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杨国梁认为,在项目资金的支持方式上还是应当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据杨国梁介绍,国外基础性、前沿性和实际应用结合得不是很紧密的研究大部分的资助者是政府,其所采用的方式也都是“前补助”的方式;而很多与市场结合比较紧密的、应用性比较强的项目大部分的资助主体是企业及相关的社会经济单元。“我国政府资助的方向比较宽,基础研究和应用性研究都在资助之列。”

杨国梁认为,科技重大专项资金“后补助”的意义何在可能值得思考。“因为如果一项研究是重结果的,是为了解决技术或应用上的需求,那么在这项技术进入市场之后应该会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如果该项研究已经攻关成功,产生了经济效益,政府资金进行后补助的意义何在?”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向涛也认为,应用类型的研究如果成功的话自然就市场化了,不用再以“后补助”的方式给予经费,“这种性质更像是奖励而非资助。”

而在前补助领域,特别涉及到科学共同体的信用机制。“国外的做法通常是在立项之后一

次性拨付款项或分期拨付,在款项拨付研究单位之后,该研究单位一般会有专门的部门,比如项目管理办公室,跟踪项目进展情况和监督经费的执行情况。”杨国梁虽然认同监督机制所能起到的作用,但更认为是科研人员的信用机制在经费的使用上发挥作用。

“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有自己特殊的国情,科研领域也不例外。如果经费的拨付分为几个阶段进行考核,科研人员的时间会耗费在填表上。一次拨付又对经费和项目的执行、科研人员的信用机制要求较高。长期来看,随着科学共同体逐渐成熟,形成更好的科学共同体诚信建设制度,用声誉来约束科学共同体是未来的趋势。”杨国梁坦言,就目前的情况来说,一次性拨付和分批次考核拨付各有利弊,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方案。

管理工作经费可不经项目组

重大专项在资金使用上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项目资金或课题资金,另一部分是管理工作经费。直接费用主要包括设备费、材料费、会议差旅费、劳务费等。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一些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比如,项目研究所需的房屋占用、日常水、电、气、暖消耗,有关管理费用的补助支出,以及激励科研人员的绩效支出等。

“项目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专项经费是只能用于科研的,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管理工作经费不在其中。但是,管理工作经费也需要有地方支出。我们现在对科研单位的支持是有基本事业经费的,这部分经费用来涵盖管理工作经费。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可能会有涵盖不足的情况,需要从项目中提取一定比例来补充。”杨国梁建议,可以有两种方式优化资金使用。

第一种方式是,从国家的角度首先应当保证科研机构的基本运行费用,由科研人员承担的课题专款专用。第二种方式是由资助部门和项目组的依托单位自行商议拨付间接费用的额

度和方式。“国外科研机构的管理工作经费主要用来支付管理人员的工资和项目运行的其他间接开支。但这项费用不是一个固定的比例,而是由资助方和被资助项目的依托单位进行协商。关于项目的直接经费是拨付给课题组的,而间接经费是直接拨付给依托单位的。后者由依托单位与资助方就具体的费用进行成本核算后自行商定,而不是在拨付给课题组全部经费后再划定一个特定比例给依托单位。”

据悉,目前《办法》中关于间接费用还是实行总额控制,按照不超过课题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购置费和基本建设费后的一定比例核定。具体比例如下:500万元及以下部分为20%,超过500万元至1000万元的部分为15%,超过1000万元的部分为13%。

减政放权的核心是做好制度建设

作为此次《办法》修订的主要原则之一,简政放权的目的是遵循科研活动规律,坚持以人为本,加大激励力度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和创造性,推动重大专项任务目标顺利完成。主要措施是给予专业机构预算评审权,放宽牵头组织单位、专业机构和承担单位预算调剂权。实行决算报告制度,取消财政部结账财务决算审批。

在杨国梁看来,什么样的专业机构有预算评审权?专业机构在得到授权之后与政府又有什么区别?是如何运行的?如果是通过专家进行评审,与政府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又有什么区别?这些都是此次《办法》中在简政放权方面应该探讨的问题。

“简政放权的方向肯定是一个进步,但在具体操作上有许多问题需要从制度设计的角度予以充分保障,让专业机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杨国梁说,不管是预算评审,还是预算调剂,其核心还在于规范和制度建设,“要像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那样把这件事‘放进制度的笼子’。”

三思堂

栏目主持:韩天琪 邮箱:tqhan@stimes.cn

人是制度的一个环节

沙森

近日央视曝光,网上有中介公司称可办留学文凭,不用上学,只要花钱,就能直接拿到国外某所大学的毕业证,而且能够通过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官方认证。对此,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处的负责人回应称,“任何单位都有廉政风险,技术上可以堵得住,但人员出了问题就没办法,虽然有程序,但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没有漏洞”。

学历造假原是指造一个“假”学历出来,而现在有些中介公司办的留学文凭,居然可以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官方认证处得以确认。你说这是“假”文凭,文凭的持有者确实没有文凭所证明的学习经历;但它确实确实又是那个“真”文凭——获得了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的官方认证,难道还不够“货真价实”吗?

让“假”文凭变成“真”文凭的最后一公里无疑就在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该中心是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是“真”文凭的把关者、鉴定者,而今反倒成了“假”文凭的制造者。这种角色转换背后的原因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深思。

所谓“没有需求就没有市场”。文凭造假风猖獗多年,说明“唯文凭”的社会风气依然如故。“文凭崇拜”和“文凭歧视”依然站在人才评价标准的两极。放眼就业市场,名校的文凭依然可以作为求职的一块“敲门金砖”,而普通高校甚至专科的文凭在就业时则意味着更少的机会和可能性。

而“没有制度漏洞就没有可乘之机”。留学服务中心认证处的负责人称,任何工作都是要交给具体的人去做的。即使制度没有问题、技术没有问题,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没有漏洞。但该负责人是否忽视了一点,制度所要保证的不只是程序、规范等硬性的建设,更要保证不管什么人身处这个制度当中,制度都能良好运行。如果人能够轻易地改变制度,从根本上说,还是制度建设出了问题。所有涉及权力的人都要在制度的框架之内,而非掌握着随时可以走出笼子的“钥匙”。

人即是制度的一个环节,如果人出了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制度出现了漏洞。

声音

我国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及变化趋势

欧阳志云

全国生态系统复杂多样,空间差异大,以草地、森林、农田和荒漠为主,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82.8%。由于气候、地理条件的影响,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对人类活动的干扰十分敏感;同时,悠久的历史、巨大的人口数量和高速的发展导致的高强度资源开发,对我国森林、草地和湿地等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巨大影响,生态系统退化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问题。自2000年以来,尤其十八大以来,各级政府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启动并实施了主体功能区规划、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转移支付、以及三江源生态恢复、京津风沙源治理、岩溶地区石漠化综合治理工程等一系列生态环境政策与生态保护、生态恢复与生态建设工程,我国生态系统面临的问题开始发生转型,从由农业开发导致的生态问题向工业化、城市化导致的生态问题转变。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沙漠化、石漠化等问题仍然严重,但面积与程度在下降,森林与草地生态系统质量低但总体在改善与提高。我们目前面临的生态问题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生态环境脆弱,生态系统质量低。我国是世界上生态环境脆弱的国家之一。由于气候与地理条件的原因,形成了一系列生态脆弱区。在高强度的人类干扰下,生态系统退化严重,人与自然矛盾非常突出。全国生态环境高度敏感区域面积390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40.6%,而生态环境脆弱区面积占国土面积的60%以上,西北干旱半干旱区、黄土高原区、西南山区和青藏高原区等地区尤为突出。全国森林与草地质量低下,生态系统质量低等与差等级的面积比例分别占三种类型总面积的43.7%和68.2%;质量为优等级的面积比例仅占森林与草地生态系统总面积的5.8%和5.4%。局部地区生态系统质量仍在下降,如有17.6%的森林与34.7%的草地生态系统质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2.土地退化问题仍然严重。我国土地退化主要表现为水土流失、沙漠化与石漠化等方面,当前土地退化面积较大,但面积与程度均在下降。

(1)水土流失。全国水土流失强度较大的区域主要分布在黄土高原和西南地区,其中极重度水土流失主要发生在黄土高原和四川、云南局部地区;东部地区水土流失强度相对较小。自2000年以来,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减少,从177.78万平方公里减少到167.75万平方公里,减幅为

5.6%。其中,极重度水土流失面积比例减少幅度最大,减少16.1%。

(2)土地沙漠化。我国沙漠化土地面积大,以极重度及中度沙漠化等级为主。沙漠化土地面积最多的省区是新疆、内蒙古和西藏,三省区的沙漠化土地面积占全国沙漠化土地总面积的82.0%。近年来,全国沙漠化土地面积整体减少,但仍有部分地区沙漠化程度加重。沙漠化土地面积减少11.61万平方公里,减幅为6.0%。其中极重度沙漠化区呈减少趋势,轻度沙漠化面积增加。沙漠化程度减轻的地区主要分布在内蒙古东北部、黄土高原西北部和新疆北部等。

(3)西南地区石漠化。全国石漠化区域主要分布在贵州、云南、广西、四川、湖南、广东、重庆及湖北八省(区、市)的喀斯特地区,总面积为9.56万平方公里,占八省份总面积的17.9%。近年来,全国石漠化程度有所改善,主要在贵州大部、云南西南部等区域,但部分地区有恶化的趋势。

3.生态系统人工化加剧,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减少。

2000-2010年间,人工林、库塘等人工湿地和城镇面积显著增长,自然森林、沼泽湿地和自然草地面积持续减少,生态系统人工化趋势进一步加剧。全国人工林面积约占森林生态系统面积的1/3。全国城镇面积明显增加,十年增加了5.56万平方公里,比2000年增加28%。全国水库数量8.79万个,水库水面5.28万平方公里,总库容7162亿立方米,分别占全国陆地水体总面积的26.1%和全国河流径流总量的23%,十年间水库面积增加了3.1%,自然河段长度比例不断下降。

4.流域生态破坏严重,生态风险巨大。由于水资源与水电资源的大规模开发,我国河流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冲击,河流断流、湿地丧失及废水排放显著增加,水环境污染严重,生物多样性减少且生态调节功能低。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的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尤为显著。

(1)长江流域的主要生态问题表现为自然湿地丧失严重,自然生态系统质量低,水土流失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重、河道断流普遍发生,湖泊水环境污染严重,水生生物多样性丧失加剧。水资源开发强度大,生态隐患大。长江上游支流水电开发强度大,河道断流普遍发生。断流、水环境污染以及水库和水电建设,导致河道片段化、江湖阻隔和水环境恶化,

野生动植物栖息地丧失与退化。长江水生生物多样性丧失严重,白鲟已功能性灭绝,江豚、中华鲟等珍稀濒危物种种群数量不断下降,濒临灭绝。

(2)黄河流域的主要生态问题有生态系统质量低、水土流失严重、水资源过度开发、河流断流加剧、水环境污染严重。黄河流域优、良等级森林生态系统面积比例仅为7.4%;优、良等级草地生态系统面积比例仅为30.0%。水土流失面积比例达63.7%。由于水资源开发利用增加,全国断流河流愈来愈多,断流河长度不断增加,断流时间不断延长。黄河27条主要支流中,11条常年干涸,黄河下游干流已经成为人工控制的水库”。

(3)海河流域的主要生态问题有生态系统质量低、水资源过度开发、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河流断流与水环境污染严重。海河流域优、良等级森林生态系统面积比例仅为4.6%,水土流失面积比例达30.7%,水资源总开发利用程度为98%。全流域浅层地下水超采严重,总开发利用程度高达110.4%。

5.城镇扩张失控,人居环境恶化。

城镇扩张摊大饼现象普遍。大多数城市建成区呈摊大饼式的单中心扩张模式。2000年以来,17个重点城市主城区面积扩大了2-4倍。城市生态调节功能不断降低,全国所有大城市“热岛效应”不断增强。2000年以来,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和长沙等城市的“高温区”范围都有明显增加。全国62%的城市存在城市内涝,其中74.6%最大积水深度超过50厘米,对居民生活带来严重影响。城市大气污染严重,居民健康风险加大。城市绿地结构简单,外来植物比例高,如北京城区外来植物物种占比高达52.7%,野生动植物种类少,种群数量低。

6.矿产资源开发严重破坏生态,环境风险大。

全国矿产资源开发扩张迅速。2010年直接破坏地表面积在5公顷以上的矿产开发点达52566个,分布于全国1774个县。十年间新增矿区面积为2285.17平方公里,占2010年矿产总面积的32.26%。新增矿区面积55%分布在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严重,地面沉降、滑坡、地裂缝和溃坝等次生地质灾害频发,对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作者系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副主任)